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王宗仁 / 等著

T U O Q I J I A N G X I N G D E R E N M E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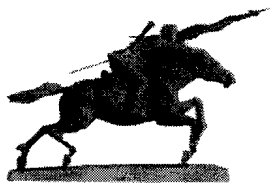
托起明星的人们

后勤指挥学院知名专家教授风采录



托起将星的人们

王宗仁 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起将星的人们/王宗仁等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7
ISBN 7-5033-1392-7

I. 托… II. 王…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6517 号

书 名:托起将星的人们

作 者:王宗仁等

责任编辑:侯健飞

装帧设计:蒋 浩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mail: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威远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13 千字

印 张:7.875

插 页:12

印 数:3000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392-7/I·1210

定 价:16.00 元

序言

◎周坤仁

在刚刚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后勤指挥学院组织采写、编撰了《托起将星的人们——后勤指挥学院知名专家教授风采录》一书,旨在宣传军校园丁的典型事迹,展示军校生活的独特魅力,以激励更多的人才热爱军事教育事业,献身军事教育事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军事教育事业是崇高的事业,军校教官是令人敬仰的工作岗位。不少比喻,像“红烛”、“人梯”、“春蚕”、“园丁”等等,都是献给教师的,这当然包括军校教官们。那么,军校教官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书中所刻画的11名人物形象,用他们朴实无华的言行诠释了军校教官神圣而庄重的外延与内涵: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苦心孤诣研究党的创建史,近半个世纪倾心育人;后勤理论专家杨少俊研究员在全国率先运用计算机技术传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军事仓储学学科创始人王宗喜教授视“做学问”为“最大快乐”;后勤管理学学科主要创始人李祝文教授是“农人般辛勤劳作的理念制作者”;还有宋学先研究员、於志明教授、孔庆程教授、李怀信教授,以及郝万禄、刘博、范志国等总后“科技新星”,等等。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在军队自身建设与改革中,默默无闻地奠基、营构着理论大厦,默默无闻地栽培、浇灌着三军桃李。

可以说,这一组人物群像,是总后院校教官队伍的代表,是军事教育战线的代表。他们献身党的教育事业,表现出可歌可泣的勇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他们恪守培养高素质后勤指挥管理人才的神圣职责,展现出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创新品质;他们安贫乐道、襟怀坦

托起将星的人们

荡,体现着军校园丁特殊的人格魅力。他们,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赢得了尊敬,赢得了爱戴。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教官们拼搏、牺牲、奉献、创新的片段,我们从中可以更加贴近地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更加深刻地领悟他们对事业的执著与忠诚。

兴教办学,人才为本。从过去第一任院长李聚奎将军的以身示教,到现在出名师、出名家、出名著的“三名工程”和创金星、争银星、树新星的“三星工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后勤指挥学院始终保持着注重教员队伍建设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氛围。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亲切关怀,具体落实到人才队伍建设上,这是后勤指挥学院长足发展的不竭动力。完全可以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给大家提供一个路标,吸引、激励更多的人才沿着书中人物群像走过的道路前行,为创办一流的指挥院校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

我还特别注意到,在这本书的作者队伍中,有擅长反映青藏高原军旅生活的知名作家王宗仁,有文笔细腻且善于驾驭重大题材的女作家曹岩,还有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业余创作骨干。这说明,总后近几年的军事文学创作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感谢他们为这本书付出的辛劳,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他们为总后的军事文学创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01年3月28日

(序言作者: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上将)

目 录

序言	周坤仁 (1)
资政育人的将军教授邵维正	肖思科 (1)
毛泽东·邓小平“走进”电脑	李 欣 (27)
——杨少俊研究员研究传播科学理论纪实	
军事物流学的掌旗人	肖思科 (51)
理论的寂寞与快乐	曹 岩 (75)
这里的喝彩没有掌声	李 骏 (97)
不忘跨越	王宗仁 (123)
——於志明教授素描	
拓荒者之路	孟隰生 (147)
——孔庆程教授创建军队后勤文书学纪实	
丹心播火李怀信	罗元生 汪国良 (169)
追赶理想的脚步	冉阿丽 (199)
美丽青春	姜承友 (223)
沉寂中的收获	王文娟 (237)

资政育人的将军教授邵维正

●肖思科

在常人印象中,将军多与兵戈铁马、硝烟鼓角和谋略指挥相联系。可邵维正将军却是麾下无一兵一卒、面前没有沙盘战阵、居室也没有铁枪利剑的例外者之一。

邵维正将军以党史为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多次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考证中共“一大”,反驳中共是“私生子”的攻击,到全面研究党的历史;从进行党史研究,到不断用新成果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结合,进行宣传、传播和普及。将军由点到面,从纵到横,通过党史资政育人,现已享誉海内外,曾受到江总书记接见,得到胡乔木同志赞许和老一辈革命家称道。

—

1978年,对邵维正而言,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多少年之后再看,当他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之时,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正在发生一个急转弯。

那一年,这个在50年代初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已越过了不惑之年。邵维正28年的军旅生涯,是在部队基层的宣传战线上度过的。从文化教员,到宣传科长,都是在从事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与他命运转折相关的,那就是他曾被选派到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党史。

托起将星的人们

不过,谈起那段学习,邵维正客观地讲,是既学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原理和党的基本历史,同时也看到了当时党史的研究、传播和普及的局限。因为学习是在60年代,将军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些偏颇例证和扭曲叙述。

例如当时铅印的《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中,涉及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共8章34节,其中有20节是以“伟大领袖”为主语,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图解的。

党的历史变成个人崇拜史是其一。其二是党史变成了路线斗争史。不过他认为最不应该的是歪曲历史和否认事实,践踏由千百万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写下的党史。

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会记得,由林彪担任编委主任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一书。该书除提到毛主席350次之多外,提到林彪130多处,提到江青5处,提到周恩来只有两处,就更说不上中共的大多数创立者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后来到了第四稿时,连周恩来的两处也删掉了。再往后,居然出现井冈山的会师成了毛泽东与当时还在朱德、陈毅手下任连长的林彪会师了……

回首往事,邵维正有许多感慨。但他庆幸: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中国的历史还原到本来面目,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度被践踏和歪曲的党的思想路线得以拨乱反正。同时,党的理论教育也急需人才。

于是,当年被林彪、邱会作一度关闭的全军三大院校之一的解放军后勤学院复建,政治理论教学开课更是当务之急。邵维正因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并专门学习过党史,于是从西北战区的部队调入北京,正式与党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结下不解之缘。

一切都是新的一页,一切都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当邵维正调入北京时,党史界正在面临一次思想革命。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党史研究混乱的状况,中央有关部门正式把开展党史研究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以此作为基础工作,从而为党的理论教育、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和党史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保证。

当时,党史研究问题反映到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面前,老人家们的意见落地有声:

“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要实事求是,对党史的史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查清,一锤子一锤子敲定。”

从此,党史界的拨乱反正拉开了序幕。

邵维正初到北京,在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正当他为缺乏客观的中共党史教材发愁的时候,国家已批准编辑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其间,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正在调集人员,准备上马。由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套多卷本史书的编撰工作,从军队的三大院校中借调了几位同志参加。

有一点,邵维正没有意料到,他也属于当时的调集人员之一。当上级通知送到他手中之时,他才知道自己赶上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地处北京西山东麓、颐和园畔的中共中央党校是人杰地灵之处,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静谧,而在这静谧中又充满着激情。70年代末,这所以培养中共精英人才著称的党的最高学府,为全党的转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支撑。那些珠玑良策,多数都是在这静谧而激情的夜晚产生的。

邵维正是主楼里繁忙中的一员。借这块宝地,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在这里拉开战幕。12卷本的大型历史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一卷《伟大的开端》编撰工作已进行了分工,他接手的任务是参与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撰写。

深夜,当一本本厚厚的资料进入脑海之后,他被先烈们的业绩感动的同时,也被党在创建时期一些未释的“悬案”困惑着。

是啊,本世纪初叶,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共产主义小组就在各地兴起。从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影响力,真是波澜壮阔,雷霆万钧。

然而,当他意识到由于革命之初的秘密性和隐蔽性,加上岁月经

托起将星的人们

年，时过境迁，大量当事人或去世或记忆不清，造成许多“悬案”时，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

然而，真正的沉重是他在这不眠之夜，又得知来自海外反共专家们的鞭笞般的抽击。

灯光下，一则来自巴黎东方学者 29 届大会上的历史资料，特别刺眼：

“中共‘一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纪念日。自 1921 年到今天，中共年龄已达 52 岁。可是还弄不清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付与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

讲这话的是台湾反共学者郭华伦。他这篇发言不是孤立的。这与一些反共学者谩骂中国共产党成立“缺乏社会基础”，称之为“舶来品”和“卢布党”等反共论调，构成了一股反华大合唱。

在“冷战”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并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但借助中共党史本身践踏中共形象和尊严，给一个站在历史转折大潮中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感受则是不同的。整个夜晚，邵维正如坐针毡，如鲠在喉……

多少年后，邵维正说，是信仰、责任和使命感，使他由气愤转入理性的思考，并切实关注起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二

邵维正曾经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败落，经历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家做主的蓬勃崛起，邵维正从小就是一个进步的少年。

据邵维正回忆，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南方革命活动的影响，家庭都很拥护革命。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后来曾在人民教育战线和新中国航空工业战线上服务，这一切都得益于父母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他母亲是旧时贤德之女，但教育子女却有知识救国之图。邵维正从小受父母正直、贤德的影响，同姐弟一样勤学苦研。

1951 年春天，当抗美援朝的爱国热火燃及祖国大地时，邵维正弃

学从戎，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园里，他开始学习党的理论，开始革命实践，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成为党的一员，他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深情和信赖。

谈起他后来的选择时，他说：“反共学者们提出了这个攻击点，给我也找到了一个反击点。那一阵子，我特别注意收集有关‘一大’召开时间的材料。要反击，首先要弄清他攻击的对不对。待材料找到后证实，‘一大’还真是有‘悬案’留在这里。”

邵维正把目光放到先确定党的生日“7月1日”的来龙去脉上。他开始对“7月1日”这几个字眼儿进行叩问，并且，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

1936年春，斯诺在延安访问毛主席。当谈到中共成立召开“一大”时，毛泽东有这么一段话：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五月，是指当时的阴历说的，经查对阴、阳历对照表，1921年阴历五月已是阳历的7月。这则谈话表明，7月是无疑的。这大概也是中共较早向外界宣告自己的生日。

生日究竟何时？这也是建党17年时，即1938年初夏，刚结束马背生活的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反复考订的事。当时，参加中共“一大”到延安的人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夜间躺在博文女校的地板上不停地扇扇子”……但确切日期难以记准。董必武也认为是7月，但也记不清准确时间。

最后，此事由毛泽东同董必武拍板：

“7月，7月是没错的！”就把纪念日定在月首。

毛泽东在是年5月26日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

以这句话为基点，中共陕甘宁边区马上号召：“我们决定今年7月1日到7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由此拉开地方性的纪念序幕。

到1941年，中共西北局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行文通知：“为纪念中共诞生廿周年，‘七一’放假一天，开纪念会、会餐，举行娱乐晚会。”这

托起将星的人们

便是“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的由来。

从这一点来看，“7月1日”是党诞生的纪念日，而不是“一大”开会的准确日期。这是邵维正查证的结果，有两点依据：

其一，毛泽东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纪念日，并不等同于一大会议日期。

其二，董必武在接受访问，谈起中共“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情况时有言：“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

从这两句话来看，至少，“一大”日期是有待于考证的。

“重新考证‘一大’！”

尽管“两个凡是”在当时已被否定，但这仍然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七一”毕竟是毛主席提出的。几十年来，多少人接近这个研究边缘，却又退缩回去。但邵维正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还有一点，他是一个军人，军人的斗志使他下决心去打击那些反共专家的攻击。邵维正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得到领导和同仁们的支持。于是，邵维正在开始编撰工作的同时，也一并开始了“一大”专题考证研究……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出的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听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汇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情况之后，马林便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这一切，似乎有些仓促，又似乎是水到渠成。6月上旬，上海作为中共成立的联络大本营，向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区以及留日学生，发出会议通知……

邵维正也想不到几十年前中共创建者的热血沸腾还会给中国国内党史界和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者带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扰。

关于几十种中共成立时间的说法，是邵维正从众多资料中得来的。那一阵他拼命地从文献中收集信息。中央档案馆、党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有关存放文献的地方，他都去过。踏破铁鞋，得到的并不是“一大”的准确日期，而是数十个不同的日期。

多少年后，邵维正将军打开一张他当年制成的“大会日期研究提要表”，足见他的准备是充分细致的。在几十种文献记录中，可以找到以下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

——1921年，斯穆尔基斯在信件中记载：7月23日和8月5日；

与这一时间相吻合的有佚名作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彼尔西茨的《亚洲各国人民》的研究文章等。

——1924年，大会参加者陈公博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记载时间为：7月20日；

与之相吻合的有乌伊尔布尔的提法。

——1951年，当年“一大”的重要人物李达在《“七一”回忆》中认可“7月1日”；

当年“一大”活跃人物张国焘在回忆中也承认此日。

——1927年，另一位当年“一大”出席者周佛海在回忆中声称，“中共”一大召开时间为7月；

同样提法的有邓中夏的回忆、包惠僧的回忆、董必武的回忆和日本波多野乾一的文章等。

更有甚者，是米夫“8月7日”的提法，尤安科“6月之说”和卡拉切夫的“5月印象说”……

几乎是百人百见，众说纷纭。当邵维正试图向客观准确的目标走近时，他也没有意料到一个会议的日期，会给历史留下一个万花筒一般的世界。

大概这就是史学家与一般人的不同，大概这就是信仰和责任的作用。邵维正知道自己遇到了难题。

但他清楚，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因为，世人的目光关注着，历史关注着。放下来，等于承认反共专家的攻击；等下去，党史不能等，国人不能等，后代不能等。邵维正那一阵经常起五更，睡半夜，他在无声无息地思考着这一难题。

当他占有上百万字的资料后，便开始冷静钻研、归纳分析、去伪存真。

开始，他一张一张地列表分析，一个人一个人去印证。短短的一个

托起将星的人们

多月时间，他用的卡片和纸张，就堆得好厚。

当艰苦的资料分类工作做完后，他眼前终于有了一条通路。换言之，他找到一个办法，这就是他已从代表行踪和时间上窥见，1921年7月1日，绝大多数代表没有到达上海，“七一”之说是无理由重考的……

“7月1日”的排除是从毛泽东的行踪开始的。当毛泽东定下这个日子时，他已经留下了这个党史之“锁”。打开这把锁，当然要从毛泽东行踪上寻找钥匙。

1978年，关于毛泽东一生的大事和活动尚未完全公开。除了阴历五月到上海赴会外，还有一则证言就是1953年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其中提到“1921年五月（阴历），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共第一次会议……”

假若，张国焘的回忆有几分依据的话，邵维正并没有轻信。一来因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信口开河之处很多。二则因为虽都提及“五月”，但均无准确时间，尚需进一步考证。

考证工作是艰辛的。一切都如同大海捞针，迷宫寻路。许多时候，似乎见到光明，但浩瀚的史海也有暗礁和激流。弄不好遇到一处误导，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尽管如此，邵维正凭着责任感和毅力，在文献中一点一点地汲取，在当年与毛泽东相处过的人们提供的点滴信息中寻觅。

从众多资料中，邵维正弄清了谢觉哉同志在1921年夏天与毛泽东有接触。

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了谢老的夫人王定国所著《万古云霄着意旋》一文中说：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当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邵维正眼前一亮。顺藤摸瓜，终于在1952年《新观察》上，解开了谢老的“圆圈日记”。这篇由谢老亲笔记录的《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写道：

“……忽闻毛泽东同志与何叔衡同志即要起身赴上海，我疑惑他俩

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是他俩去参加中共‘一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大会。”

随后又几经周折，查对了谢老日记的原件：“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 OOOOO 之召。1921 年 6 月 29 日特记。”

文中 5 个圈，即谢老夫人注解的内容。

就是这篇当时的日记把邵维正带到一个新天地。文中记载的到会事实、出发时间、赴会所乘工具一目了然：

湖南代表系毛泽东与何叔衡；

出发时间是阳历 1921 年 6 月 29 日；

乘坐工具是轮船。

按此信史，邵维正又查证了当时长沙至上海要先坐船到武汉，再转船赴沪。按最快到达上海时间计算，毛、何二位到上海应为 7 月 4 日以后。这一点可以证实，毛泽东至少不可能在 7 月 1 日参加会议。

证实了第一个问题，邵维正心中是喜悦的。但毛未赶上参加“7 月 1 日”的会议，其他人这天是否开会了呢？这便给邵维正引出新的问题。

这个“谜”，邵维正还是从代表的行踪中解开的。

按照代表名单，上海是李汉俊和李达。作为筹备核心，这两人无疑在上海，文献资料也证实无误。

再则是北京小组。北京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刘仁静。

张国焘回忆自己是 5 月抵沪，使用日期的年历同毛泽东记忆时间一样。张国焘是经由济南赴沪的。当时，济南也有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到济南后，王、邓约了济南 8 名党团员到大明湖划船聚谈，第二天 3 人一起赴沪。经查材料，这一点得到证实：张、王、邓到达上海时间应在 6 月 15 日以后。

武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

据董必武 1932 年接受尼姆·韦尔斯采访时说：“我参加了 1921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他介绍有陈潭秋和他，但对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武汉小组代表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是陈潭秋在 1936 年留下的。

托起将星的人们

陈潭秋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是1921年7月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女子学校里，突然来了9个客人。他们下榻在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客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记得是7月下半月。

另据广州的包惠僧回忆：“董必武、陈潭秋两人同时到达上海，和我到达上海的时间不相上下。”

广州的另一代表陈公博的时间不会错。因为陈在《十月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记载：

“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我憧憬之时，没有度蜜月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7月14日启程赴沪。”

此文写于会议结束之后的当月，应为可信之说。

余下只有旅日本小组代表周佛海的时间。周佛海当时在日本鹿儿岛读书。据他本人讲：“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凑巧暑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按从日本学校暑期回国时间推算，周佛海到沪也是在7月下半月。

考证至此，邵维正原来对“7月1日”并非一大开会日期的判断有了充分的证据：

“若7月1日召开会议，从代表的行踪来看是不可能的。当天，能到达或原在上海的人数只有5人。这5人中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和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按邵维正的查证，当时在上海的代表不足半数。而众多当事人回忆这次代表大会是全体出席，自然会议在7月1日开幕是不可能的。

这是邵维正对“7月1日”会期的排除和否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一步。多少年后，历史证明他的史实考证是扎实的。除开找到当事人留下的文献，多数都有旁证作参考。为了进一步用口述史料来印证这一判断，邵维正还在1979年夏天亲自访问当年参加会议的两位健在的老人刘仁静、包惠僧。

第一次，邵维正四处打听，找到住在北京市白云路的刘仁静家。

同许多命运曲折、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刘仁静对邵维正的来访并

不热情。当询问其时间时，老人以“老了”、“记不清了”为借口，推脱了回答。直到临别时，老人只透露了这么一点信息：

“与邓中夏一起从北京动身南下，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会议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才去上海参加‘一大’。”

老人是否确实忘记“一大”日期？还是因为现在日期是毛泽东定下的不便直说？不得而知。但给邵维正留下一个谜也留下一线希望。

只要有一线希望，一丝生机，邵维正也不愿放弃。从刘仁静家出来后，他就跑到图书馆查《少年中国》。由于这类刊物当时各馆都未作为主要收藏，他便找到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从散本中清理查找。

夏日里，炎热无比。而图书馆库房要求是严格的，不准喝水，也不准抽烟，四处是书，活动身子的地方很小。邵维正一捆一摞地搬，一架一架地找。最后，终于找到了《少年中国》的刊物，并从刊物中查到刘仁静的活动记录：

“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学者有刘仁静、邓中夏、张闻天……二十三人。”

颇有趣味的是，刊物不但记录了刘仁静的行踪，还刊登了他的发言。邵维正估计刘仁静老人已忘记了这个发言，便一字一字抄录，以待改日送上。

第二次，当邵维正将抄录的刘仁静发言送到刘老手中时，老人真是感动了。这不仅是老人的珍贵资料，也帮助了老人回忆。

“7月7日前后到上海的，不会有错。”老人开了口。

邵维正四处寻觅，终于敲开了北京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区包惠僧老人的房门，当他听邵维正翔实的分析后，感到来访者是严肃做学问的人，便启开了久远的记忆：

“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比我早走一天，先到香港，坐邮船到上海。我是7月15日坐船直赴上海，大约7月20日到达。”

刘、包二人的话虽不多，但解决了关键问题。不仅证实了他们的时间，同时也相互旁证了陈公博等人的行踪。

“活史料”证明邵维正的否定和排除是准确的。而真正正确的时间就在这复杂的否定中走了出来……